



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

责任编辑 孟筑敏
封面设计 石俊生

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

第二辑

西南军阀史研究会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125印张 259千字

印数 1—3,400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11115·67 定价：1.55元

·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

第二辑

西南军阀史研究会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贵阳

目 录

- 试论军阀史的研究及相关的几个问题……………孙思白 (1)
- 要重视西南军阀史的研究……………荣孟源 (10)
- 军阀与近代中国社会……………陈旭麓 (14)
- 辛亥革命与近代军阀统治的产生
——关于近代军阀产生原因的一点探索……………冯祖贻 (26)
- 略论南北军阀之异同……………谢本书 (39)
- 西南军阀与鸦片贸易……………高言弘 (49)
- 试论盐务与川、滇、黔军阀形成发展的关系……………林建曾 (61)
- 略谈陈宦为袁世凯图川……………马功成 (77)
- 川、滇、黔军在成都巷战始末……………马宣伟 (88)
- 四川军阀的横征暴敛及其社会后果……………匡珊吉 王建军(102)
- 川、滇、黔军阀对自贡盐业的劫掠和控制
……………钟长永 宋良曦(125)
- 四川军阀割据时期之兵源考……………胡汉生(137)
- 滇军第二次入黔浅析……………孙代兴(159)
- 周西成图滇与龙、李倒周……………荆德新(175)
- 西南军阀混战中的黎天才……………高光汉(186)
- 旧桂系军阀在广东……………夏琢琼 钟珍维(196)

关于陈炯明叛变的几个问题·····	余炎光(210)
略谈陆荣廷的治桂权术·····	苏书选(225)
谭延闿与南北军阀战争·····	蒋崇伟(237)
护法战争期间南北军阀在湖南的争夺及其影响·····	贾维诚(255)
评湖南的联省自治·····	王永康 周秋光(266)
何键是怎样从政主湘的·····	李炳圭(277)
贵州军阀刘显世的兴起及其特点·····	杜文铎(288)
贵州军阀兴义系“新派”的崛起及其与“旧派”的斗争 ·····	熊宗仁(300)
袁祖铭与吴佩孚的关系·····	刘毅翔(316)
贵州军阀的后期统治与桐梓系集团的内部纷争·····	范同寿(327)
贵州军阀统治时期的土地兼并问题·····	胡克敏(342)
贵州军阀与鸦片·····	马凤程(349)
近年来北洋军阀和地方军阀史的研究·····	焦静宜 来新夏(364)
附录	
西南军阀史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所收论文、资 料、书面发言目录·····	(380)
编后·····	(383)

试论军阀史的研究及相关的几个问题*

孙 思 白

一、从《民国史》的编写工作说起

近代封建军阀割据及其反动统治的历史是民国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所以今天先从民国史谈起。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学术、教育界首先着重讲解、学习、论述中国近现代革命史和中共党史，这是有重大现实意义，十分必要的。今后也仍然必要！世世代代都应学习我党党史和近现代革命史。

我们没有把民国史或军阀史看得比党史和革命史更重要的意思。

但是，历史的运动是对立统一的运动，民国史（包含军阀史）的研究与革命史、党史的研究绝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促进的。

因此，我们说，民国史与军阀史也应该研究。

“民国史”这项编著任务，如大家已经知道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领导人早就倡议的，在周总理决定把这项任务列入出版计划后，工作已进行了十年。它在国内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人民日报》最近开辟了“学点民国史”专栏。

* 本文系作者在一九八二年八月贵阳召开的“西南军阀史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的书面发言。

“西南军阀史研究会”是一九七九年在成都史学规划会上发起成立的。三年来，在这个研究会的推动下，西南六省（区）的同志们做了很多工作，成绩卓著，成果累累，是值得祝贺的。

军阀史不等于民国史，但它是民国史上重要组成部分；西南军阀史更不等于民国史，但它又是军阀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南军阀的派系纷争，割据混战情况，异常复杂，过去研究成果比北洋军阀更少，大多数人对它几乎是不甚了解，所以更值得花工夫去探索。

历史书体例有通史、专史之别。党史、革命史、军阀史都是专史性质，任何一种民国时期的专史成果将来都可汇入民国通史，对写通史都是有益处的。

二、军阀史研究工作的用途

我们把民国史上那些拥有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的个人或集团，称之为“军阀”、“军阀集团”，就是意在贬斥他们；他们把自己叫做“督军”、“巡阅使”、“大总统”，不叫军阀。总的说来，他们是人民的压迫者、剥削者与统治者。他们是站在与人民对立的一边，是反面人物。

但是，他们却是那个时代政治舞台上的掌权者、主宰者，小的代表一省或数省，大的代表了国家。这样来说明他们的地位、作用与影响，与“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命题是不是矛盾了呢？并不矛盾。这是各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

毛主席要我们懂得历史，并没有说我们只懂得正面的革命历史就行。历史这门学科具有规律性、借鉴性、知识性。学习历史不限于正面，也要懂得反面。毛主席在他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就有“中国国民党的战争史”一节，说：“辛亥革命以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向他们学习”，从中得出“枪杆子里出政

权”这一有名的结论。

马克思也留心研究过若干反面人物和反动事件，给后人以重要启示。例如：一八四八年发表的《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八五一年发表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等都是。

列宁不是曾把“帝国主义”作为研究对象而写出众所周知的名著吗？

可见，研究工作能否有益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首在于研究者的立场、观点、方法如何，而不在于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立场、观点、方法错了，研究革命史也会发生歪曲；立场、观点、方法对了，研究帝国主义史可以有用，研究军阀史也可以有用。

一门专史的用处，具体列举是不必要的。军阀史研究的作用，就其大的方面，粗举数端：

（1）辛亥革命，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但其后，反而出现了“群雄”割据、混战不休的局面，从历史的眼光看，这自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但是他们的混战却打不出一个象过去历史上那种“大一统”的局面来，因为它是在二十世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基础上形成的奇异状态，与历史上的群雄逐鹿不同。几十年的军阀统治割据史，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有其可探讨的特殊问题，而且在社会经济上、文化思想上也有其可研究之处。例如说：大小各派军阀各自凭借什么形成的？他们各有什么特点？各在自己占据的地区内采取了哪些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反动措施？各自对人民的统治、剥削有些什么名堂？他们各自的兵、饷、军火来源于哪些渠道？他们各自的兴衰成败与人心向背的关系如何？他们各自与外国侵略势力是什么样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列举出若干来。总起来说，军阀割据，派系分裂，政局混乱，内战不休，兵匪遍地，交通梗阻，币制紊乱，教育落后，人民大众受苦受难，破产、失业、冻馁、流亡，

这一切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窒息了农工商业的正常生机，阻碍了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发展。这一切不是值得作认真具体研究的课题吗？近代世界史中的帝俄、德、日诸国都从比较落后的政治和社会经济走向了现代化的道路，为什么中国却失败了，是不是可以作比较研究呢？

所以说，民国史上的军阀统治史也是应当研究的。

（2）中国近现代先后发生的旧式的与新型的民主革命都埋根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矛盾之中。我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制定路线、策略、方针时都离不开对民国史上军阀势力统治下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作深入的调查分析。毛主席对中国社会所作的阶级分析，不只是分析了各个革命阶级，也分析了反革命阶级和中间阶层。即使是分析工人、农民各阶层的状况，那也是和军阀的压迫和剥削情况联系着的。在革命的进程中制定某一阶段的战略、策略，更是针对着各当权派的政治倾向、实力变化来采取对策。例如：一九二三年前后，在酝酿统一战线、考虑统战对象的问题上，国际远东局和我们党内开始时曾对吴佩孚以及其他实力派的性质、倾向作过一些分析、试探，而最后才确定了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为对象。又如一九三三年闽变发生后，在如何对待闽变当局的策略上，党内有过正确与错误的两种估计，最后以错误的占了主导而丧失了一次对革命的有利时机。再如西安事变前后，党对张、杨两集团和对蒋介石集团内部都以所作的正确估计为依据而取得了和平解决的胜利，成为时局的转折点。其他如红色根据地的选择，长征中的路线的变化，抗日战争时期对某些政治力量的联系与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各种战略、政略的决定等等，无不是以对当时的对立方面或中间方面的情况了解为根据的。目前，我们国家领导人号召台湾回归，实现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大业，这对我们来讲就更需要懂得国民党人的历史与现状。

就此可知：为了把现代革命史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也应当动手研究民国史与军阀统治的历史。

(3) 除以上两端外，民国史上还有许多问题，是现代革命史与党史所略而不谈或谈而不详的。比如：民国时期的政治制度、议会选举、制宪问题、财政情况、论叙制度、边界交涉、租界洋行、秘密会社、民团、“防区”以及各色人物等等，都具有历史的知识性，应为后人所了解的。

三、几个可以研究的问题

民国史或民国时期的军阀史，在现代史学领域中是待开垦的荒地。解放后的专著或专论，都不多。

动手研究首先遇到的是浩繁而欠整理、分散而未集中的资料问题。这是需要大家动手分工协作地去进行的事，不待多言。

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分析探讨占有的资料，对某项问题作具体研究，有些同志已经开始动手了，并作出了成绩。这代历史中可研究的方面很多，这也需要大家分工协作。

在研究问题方面，我有些轮廓式的片断设想，试举数项，和与会的同志们交流，并望指正：

(1) “民国”这一代，前面结束了两千余年封建君主专制，后面开创了社会主义制度，执其两端就可以想见居于中间一段的民国史所处地位。它是不是可以看作是经历着巨大波荡的转折时代？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风尚充满着新生的与旧存的、前进的与保守的搏斗和代谢关系。形式与内容的分裂、新质与旧量的对立、体与用的交错，构成这个时代的特色。历史上的任何一代的现象，当然都是复杂的，但似乎都没有民国一代这样的斑驳陆离。最后，自然是以旧势力的溃败或灭亡，新生力量的壮大而开辟出新局面。历史工作者是不是应从其中阐明它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的具体进程和可供求知求用的教训？

(2) 民国史上出现的军阀割据与长期混战状态，毛主席曾指出是由于帝国主义对华的分裂政策和国内缺乏统一市场的小农经济。这两项是根本的原因，说明了它与中国过去历史上出现的藩镇之类的割据，有共同的一面和不同的一面。毛主席作了科学概括，没有作具体论述。在我们作具体论述时，是不是还可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从北洋开始的割据分裂到袁世凯死后才明显地出现，而在晚清与袁当政时还能维持一个形式上的“一统”呢？我粗略地设想，这可能和长久的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有关。长期的封建“大一统”需要有一个“一尊”权力的象征重心，并被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纵然腐朽如晚清朝廷，机诈如袁世凯政府，但由于历史的积累，它仍然在占相当多数落后的人们头脑中起着一种维系力的作用。清亡、袁死之后，这样一种权力象征不复存在，于是离心倾向加大，据地自雄的割裂局面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辛亥后，孙中山当然也是有很高威望的；不过中山的威望是在觉醒起来的群众中的威望。而上述的那种传统中心象征是封建落后的文化心理上的反映。如果华老栓（鲁迅《药》中人）式的暗昧群众还象汪洋大海一样的话，中山的影响就受到限制。孙中山为什么要求“唤醒民众”的原故可以深思之。

上述传统文化心理的解释是不是可以作为根本原因之外的补充理由之一呢？我想斯大林是把“文化心理”作为民族统一四要素之一的。这点感想也许可以供同志们思考之一助吧。

(3) 民国军阀的割据纷扰，延续了几十年的现象，应不是偶然的。北洋、西南各派军阀势力有大有小，压迫剥削的为害程度有深有浅，存在的时间有长有短，这一切也都非偶然，并各有其不同特点。拿北洋时期说，皖系名声很坏；直系僵而不死；奉系名声也不好，但存在最长；晋阎虽只据一省而号称“不倒翁”；西北冯系地处贫瘠而练兵有特色；滇唐、桂陆为西南“强者”；川军派系复杂多变；东南财富之区，除浙孙外，未形成强大军阀；其他如湘赵、

粤陈、鲁张、苏齐、西北五马也都各具特色。凡此种都可以按派系、按省区找出一些课题作深入或比较的研究。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四大军事集团蒋、桂、阎、冯的消长，四大家族蒋、宋、孔、陈的形成，元老派、改组派、黄埔派、政学派、CC派之间的纵横捭阖，江浙财阀与蒋政权之间的关系，蒋介石嫡系军队与杂牌部队之间的关系，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又与北洋时期有所不同，也都可以列出许多课题作深入研究。民国期间的事件与人物，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全面分析。在御侮救亡、抵抗侵略的民族战争中，各派系集团或个人往往表现不同，对他们的功过是非，应据可信的史料，作出合乎实际的评价。“史以求信”的原则，我们同志是都不会有疑义的。

(4) 民国史上的中外关系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各帝国主义大国为了争夺在华利益，要求支配中国政治；各派军阀在争权夺利中都希望获得外国的支持。这是人们所经常谈论的。但是这个问题却是异常复杂。为了弄清他们之间的关系，需要深入地挖掘资料。需要认真地整理租界、洋行、教会、外国银行的档案和翻译各国外交文书及有关材料，以求得其真象。不然就会停留在表面的理解上，或是让一些问题晦而不明，近于空白。奉、皖两系的背后有当时日本政府的支持，是人所共知的；但日本伸手的地方不仅奉皖。英、美支持直系，从报刊舆论上很显著，从实际具体的活动上又很隐蔽，而且英、美也并非不对其他派系插手。如英、美也借款给张作霖便是一例。距边疆、海口较远的内地中小军阀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更是不易搞清楚的问题。同时，从另一方面看，军阀有需要向外国侵略势力投靠求助的一面，又有利害矛盾的一面，笼而统之地称为帝国主义“走狗”、“工具”不一定全合乎实际情况，其间关系往往是随时随地而有极多变化和复杂的内容，用一成不变的公式去硬套，往往是不恰当的。

(5) 民国史上的军阀割据，造成国家的分裂状态，社会被破

坏，人民受灾难，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我们研读这段历史，在面对着这种分裂状态的苦痛中的时候，还隐约地感到一种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起着正面作用。这话怎么说呢？过去范文澜同志研究中华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时曾指出：中国自秦汉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之后，统一与割据两种力量总是前者占优势，时间长，是常态；后者的时间短，是变态。民国史上的封建割据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是短期的。在这短期的割据中，由于多了一个帝国主义分裂因素，军阀势力不能以自身力量实现历史上那样的“一统”之局。但是纷纷扰扰之中，却总是透发出要求统一的呼声。受混战祸害深的劳动人民自然盼望那种分裂状态早日终止；爱国的社会名流、知识界、工商界人士也盼望这种无意义的战争消弭。所以民国史上不断地出现“和平期成会”、“促成会”、“弭战会”一类组织，发出和平统一的呼吁。历届总统、内阁上台，也都首先打出“统一”的招牌，虽然他们的动机多半出于为了粉饰自己的权力地位，但其中也多少曲折地反映着人民的愿望。

民国北洋时期的军阀，在自己地盘上虽然实际进行着割据（军、政、财、权集于一身），但是却又在形式上“听命”于一个“一丘之貉”的中央政府。当自身与性质相同的“中央”发生的利害冲突达到决裂的程度时，往往只宣布临时性的“自立”与“自治”，一旦利害得到调节，“自主”、“自治”立即取消。这与欧洲史上封建性分裂发展成为对内对外独立王国不同。

国民党政府时期，在军阀纷争中出现过两次与蒋介石、中央政权相对抗的“中央政权”，一次是扩大会议后在北平成立的“国民政府”；一次是一九三一年反蒋势力在广州另立的“国民政府”，但由于力量悬殊，不久即归消灭或合流。为什么在这时期能出现另立“中央”的对抗性分裂？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原因之一，这与他们各自拥有一块只与蒋介石集团分庭抗礼的“国民党党统”不无关系。这情况是北洋各派军阀所没有的。

上面所论述的“分裂”、“统一”问题，只是就军阀势力范围内的问题来讲的。北洋时期的护国、护法两役所建立的军务院、广东军政府，北伐中的广东、武汉革命政府以及后来的福建人民政府，因为它们带有一定的正义性或革命性，不能与军阀割据问题等同视之；至于我党建立的工农民主革命政权，是截然不同性质的，更不在论列范围之内。

总之，在民国时期实际存在着的封建割据纷争状态中，仍然曲折地反射出人民期望的结束混战，早归统一愿望（尽管统一问题，还应看是什么性质的统一；尽管“统一”的口号会被大军阀借口利用来对付政敌和镇压人民的反抗，那是应另外讨论的问题）。前面说的范文澜同志在谈到中国很早就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原因时指出中国社会早就“确实存在着的一个相互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并在估量到中国长期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一民族统一力量时说“即使在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用暴力和阴谋企图分裂中国，并不能真正达到它的目的”（范著《中国通史简编》绪言）。我们研究民国政治史当然首先应研究军阀割据所造成对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危害。但似也不可看不到纷纷扰扰之中所透出的与军阀分裂之势相反的民族凝聚力。这个凝聚力是历史的文化、心理等各种因素的积累所形成，是封建性分裂势力的精神阻力，潜在地表现于人心向背之中。当然，它的作用不能与觉醒起来、有组织、有领导的人民革命的威力相比拟，只是也不应该不估计到它。

今天我所讲的是些片断的设想，远不能算什么研究。近几年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研究民国史的学者不少，有的成立起研究机构；专研究滇、川、桂、黔情况的著作，也出了若干种；国外学术界对我们的工作，也很重视，有所评论。我国台湾省的同行们也都动起来，编辑资料或写专著。我们大家的工作肯定是有积极意义的，祝愿同志们携起手来，共同前进。我所讲的都不是成熟的东西，错误处请同志们匡正。

要重视西南军阀史的研究*

荣 孟 源

西南军阀史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在贵阳召开，敬谨祝贺。筹备大会的同志们叫我去参加讨论，不胜荣幸。因事不能从命，实为抱歉；失去向同志们学习的机会，殊觉可惜。对于西南军阀史所知很少，更无研究，叫我写书面发言，实在写不出；只能说一点祝贺讨论会的心愿。说话不周之处，还请原谅。

我国近代史工作，多年来着重于革命史。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是五次对外战争（即两次鸦片战争、甲申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略我国的战争），三次革命高潮（即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和一次戊戌变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是五四运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只讲这几件大事，有其客观的原因和必要。全国人民革命胜利之后，历史科学理应日益深入，逐渐觉得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一段历史几乎等于空白；五四运动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间，北洋军阀统治和蒋家王朝统治的具体情况也很少叙述。因此，说到军阀，只能笼统地说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的代表，对外卖国，对内专制，是人民革命的对象，却很难详细分析：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关系，各帝国主义共同侵略中国而又为了争夺中国相互斗争；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政治局势和经

* 这是作者在一九八二年八月贵阳召开的“西南军阀史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的书面发言。

济命脉以及文化教育，又制造军阀混战；军阀依靠帝国主义，而主子和奴才之间又有矛盾；军阀相互争权夺利，而又相互利用。弄清楚了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就便于深入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方面在军阀统治之下，逐步向殖民地沉沦；另一方面人民革命力量逐渐发展，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独立民主的新中国。一九四九年前近代的中国革命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民主主义革命。要说清楚革命史和党史，都要调查研究，详细占有军阀统治的历史资料。研究辛亥革命以来三十八年的军阀统治史，实为目前近代史工作的一个主要课题，也是深入研究革命史和党史的主要保证。西南军阀史研究会担负起研究六省军阀史的重担，填补了过去历史科学工作的空白，开辟了今后史学工作的阵地，实应祝贺。

历史、革命史、党史概念不同，不能混淆，也不能分割。中华民国的历史是三十八年间，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通史；其中当然以政治变化和政治斗争为主题，但不仅仅是政治问题；在政治史中革命史应该是重点，但不仅仅是革命史。革命史是叙述革命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历史，主要是总结历次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通史研究得越清楚，分析研究革命运动的原因、动力、经过、成败也越清楚，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也越正确。革命史要依据通史的具体情况来实事求是地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却不是一般地叙述历史。党史，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革命史中的重要问题，但不是革命史的全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是建党以来二十八年（暂不说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部分），领导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主要是总结历次党领导人民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党史和革命史密切相关，但党史不是一般地叙述革命史。例如党史中党的建设和组织发展，在革命史中就不需要写上。党史上总结经验教训，右倾或“左”倾路线对党的危害很大，也影响了中国的革命运动；但是在中国

历史上和革命史上叙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应是“四一二”和“七一五”蒋、汪叛变革命。总之，研究革命史和党史，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之下的具体问题，首先要了解历史的情况。毛泽东同志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是从分析中国的特点开始的。说明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时，首先分析国内的政治状况。历史科学要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进行工作，那就要详细占有材料，从材料中引出结论。西南军阀史研究会几年来收集了西南军阀以及与此有关的许多史料，研究了西南军阀以及与此有关的许多问题，对于研究历史、革命史和党史都有很大的帮助，对于今后深入研究历史科学和总结革命史和党史的经验教训，提供了史料和意见，更应祝贺。

军阀都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来统治人民，但是各有特点。研究军阀是为了弄清各时、各地的具体情况，弄清当时、当地的阶级关系及其特殊条件。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在抗日战争时，对敌斗争和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时刻分析各地军阀统治的具体特点。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方法来研究西南军阀，首先看到西南六省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属于北洋军阀系统；在蒋家王朝统治时期，不属于蒋家系统（在全国说来，这样的省份还有）。它们服从北洋政府或蒋家王朝，但又和所谓“中央政府”矛盾重重，每一个省都自成体系。四川一省从划分防区以来，直到抗日战争，是几个军阀各霸一方的割据局面。广东、湖南两省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除去一时曾经建立过革命政府之外，总是几个军阀走马灯式的占据统治地位。广西是老桂系军阀和新桂系军阀的交替。云南是唐继尧为龙云所代替，最后蒋介石俘虏了龙云夺得云南。贵州是派系混战，最后蒋介石趁追赶红军的机会夺得了贵州。按六个省所悬挂的国旗样式来分期，应是以北洋军阀统治和蒋家王朝来分期；按实际变化来说，又应是按各省各自政权的变化来分期。各省之间也是矛盾重重，